

乡村振兴是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新导向

【核心提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持续推进,重庆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实际服务能力仍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重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有着高度契合性。乡村振兴战略为重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供新的导向,主要体现在理念引领、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三个方面。

□吴江 申丽娟

理念引领:推动城乡服务的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于过去城乡关系的重新审视,这是在遵循城乡发展规律、转变“以城统乡”发展思路、升级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给出的科学论断。根据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城乡之间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乡村人口增长趋于缓慢,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乡村劳动力选择到城镇工作、生活,而相当部分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则留守在乡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从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升级到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也就是要真正重视乡村价值塑造,弥补乡村发展短板,促使城市和乡村共生共荣、实现共同发展。结合到重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方面,需要更加重视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从提供适应乡村发展需求的视角来设计乡村服务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以推动在保持乡村服务特色的前提下实现城乡服务融合发展,进而激发乡村潜在活力、实现乡村振兴。

目标定位: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社会矛盾转变这个重大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总要求正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村民的美好生活。农民美好生活的标志除了富裕之外,还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乡村振兴战略使重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开始更多地关注增强人民群众的服务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此,在构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和标准时,应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纳入其中。

路径选择:实现服务功能、资源配置与供给方式的三维整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又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而这些都离不开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实质上就是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支撑。2017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了以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为重点、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的总体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导向和《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的指导下,面对重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整

体不足的状态,基于重庆城乡区域差距大、仍处于欠发达阶段、属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市情,可从功能开发、资源配置和供给方式等维度设计和选择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路径。第一,在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方面,重点任务是加强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做好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等服务内容。但必须注意的是,重庆作为大城市的同时还存在广泛乡村区域,因而乡镇政府需要提供对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基本权益保护、扶贫开发与救济等方面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城乡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第二,在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方面,当务之急是厘清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立乡镇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项目。同时,还要重视畅通村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与反馈渠道,如网站建设、微信微博开通、移动客户端运用等,实现乡镇政府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的协调一致。

(摘编自《重庆日报》)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素养



□田丰

在人们还在纠结传统数字鸿沟给不同社会阶层在网络接入方面带来“不平等”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将这一问题解决。2018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其中,农村未成年人上网比例高达89.7%。

单从调查结果看,城乡未成年人的数字鸿沟似乎已经被抹平,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显示,农村青

少年的网络技能素养、网络安全素养、网络规范素养和网络学习素养均低于平均值,以硬件介入为代表的传统数字鸿沟转化为以网络素养为代表的新型数字鸿沟,而其后果比前者更加堪忧。

在缺少网络安全保护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接入网络后遭遇到的网络风险远远超过现实生活。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等问题都是未成年人无法单靠自身能力解决的。实际上,研究者对数字鸿沟的认识已经从单一的拉大群体间不平等扩展至加重、维系和缩小3种类

别——数字鸿沟既有可能加剧社会中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也有可能帮助一部分人维系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有可能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关键在于如何提升人们使用网络的能力,即网络素养。而提升网络素养的方法则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充分结合。

对中国而言,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网络素养需要高度重视。在好奇心、求知欲的驱使下,他们会探索网络世界,却极有可能为各种网络圈套所诱骗、为网络娱乐所迷惑。很多农村学校为此伤透脑筋,只能严禁学生使用手机。可这样却令留守儿童既无法与在外的父母联络,又无法融入正在使用网络的同辈群体,更会带来脱离网络若干年后成为数字时代“野蛮人”的风险。况且,严格意义上讲,学校的一纸禁令徒有形式,孩子们可不费吹灰之力就绕过种种限制,接触到不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重塑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分工的同时,引入积极的外部力量,让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进来。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无论是网络平台企业、互联网

公司、网络内容生产商,还是网络硬件生产商,都应当承担其社会责任,作为补充学校教育滞后和家庭教育缺失的社会教育力量。

互联网企业作为社会教育力量参与农村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应对未成年人遭遇的网络风险,确保网络的安全性,比如现在多数网络平台都推出了经过内容筛选和确保个人隐私安全的儿童模式;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还可以深度介入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中来,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使用技能。比如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下,腾讯“护苗·网络安全进课堂”2019年在12个省份的50余个重点乡村地区,为超过24万名乡村中小學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形成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品牌,这也是“科技向善”理念的体现。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动员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联合社会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维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为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安全的保护和网络素养的提升作出努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

乡村文化站 要有人有场地有经费

□雷元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阵地的面貌在变,综合文化站等设施逐步建立;文化工作的思路在变,“挖掘本地资源、开放办文化”的思想逐步发展;文化引导着民风在变,“节日文化”“广场文化”“文化进社区、进农村”等群众性活动深受欢迎。农村文化服务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新时代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比,还有一些短板。

一是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建成后的维修和管护还没有财政保障。场所破了、设施坏了,我们只能自己找资金,或是挤出工作经费,临时做一些小修小补。二是活动经费不能满足需要。文化站除了人员经费,每年只靠乡镇政府拿一部分资金,勉强保障文化中心阵地的活动经费,其他如组织演出、农村文化活动和、送戏下乡,都没有专门的经费预算。三是人手不够、人员老化的问题很突出。这两年我们站里配了两名兼职管理服务人员,村里有了1名文化管理员,但是待遇偏低,人员专业素质低,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

建议一是将镇村两级文化设施的建设、维修和养护等,纳入财政预算,以切实解决基层文化站的后顾之忧。二是适当解决一部分基层文化活动经费。三是文化专业人才配备向乡镇倾斜,加大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基层的力度,同时提高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待遇,加强基层文化业务的培训,让农村文化事业后继有人。

(摘编自《人民日报》)

落实基层基础工作 实现有效治理下移

□李明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落实基层基础工作,必须推进治理力量重心下沉,实现有效治

理下移。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专设“乡村治理”并明确要求,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强调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村级民主监督。

正确处理好乡村治理和三治之间的协同关系,有利于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共治模式,是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和有益探索。

(摘编自《国家治理》周刊)